



庐山牯岭胡金芳饭店

邵有光

早年,庐山牯岭有很多的客栈,又称作饭店。中国人开的,洋人开的,都不少。洋人开的饭店算都约翰的仙岩饭店最有名。而中国人开的那就太多了,有洞天饭店、严云记饭店、清凉饭店等,比较早的就是胡金芳旅社(当地人又称胡金芳饭店)了,它在牯岭一带名气很大。

说起胡金芳饭店,得先讲它的老板,老板名字就叫胡金芳,直接用自己的姓名做饭店名的老板很少,而他偏要直用。如若九江人一问:“你上山住在哪里?”对方回答:“胡金芳!”大家便都知道。

据庐山的老一辈说,胡金芳发家得益于英国人都约翰。人们管都约翰叫“都洋人”,说起都洋人,那就有故事了。早年,都洋人先是在九江开了家店铺,专卖火腿,很快就赚了不少钱。赚钱后他便上庐山,在庐山窑洼搭了几间石头屋养奶牛,专卖牛奶。卖牛奶他又赚了很多钱,就把这石头牛屋和十几头奶牛一起低价转卖给了胡金芳。卖了奶牛后,都洋人便在庐山东谷开了94号饭店,又叫仙岩饭店。胡金芳经过多年努力,也跟着都洋人从事了餐饮行业,在庐山小乐天开了家胡金芳饭店。

都洋人和胡金芳的关系十分要好。据说,这与他们两人当年都信奉基督教有关。他们两人不仅是朋友,也是生意上的伙伴,二人的友好关系甚至可以让各自经营饭店的一切生意相互通融。暑期庐山迎来客流高峰,如果客人超出接待量,仙岩饭店的客人可以到胡金芳饭店这边来吃住,反之亦然。

由于胡金芳很善于经营,不久胡金芳饭店成为当时牯岭一带最大的由中国人开办的饭店。于是饭店周围的环境,牯岭西街头发生了不少的优化:在房前,有一个一层的平房,叫小乐天,内有小舞台,可以开会可以喝茶,可以演小戏。房后是一大操场,有一个大舞台,可以露天演大戏。过了马路,是灵修会一幢两层楼的大屋,是各个宗教团体集会议事的地方。

胡金芳饭店内部,便是一个层层递进,三层楼和四层楼大屋都设有一间间的客房的格局。如果小孩子在里面躲迷藏,只需稍稍一藏,房中有屋,屋里有室的格局,保准很难找到。

楼下,又有一个大水池,现在很少人见到过。这水池是用来防火的,还是游泳池,没人知道。据庐山老一辈人回忆,后来日本人侵占庐山时,在水池里放了不少的毯子和棉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总之,日军占领庐山之前,每年一到夏天,胡金芳饭店都是生意兴隆的,它成为牯岭街头最热闹的地方之一。饭店曾住过很多社会名流,1928年4月,胡适在此写《庐山游记》,提出庐山三大文化趋势论断。1928年8月,徐志摩到庐山避暑兼翻译泰戈尔访华演讲稿,入住胡金芳饭店。1930年夏,蒋光慈来庐山疗养,入住胡金芳饭店,在此完成长篇小说《丽莎的哀怨》。1956年,丰子恺以胡金芳饭店为叙事视角,写了一篇《庐山面目》(又名《庐山游记》),侧重对庐山文化脉络的梳理与诊断。他们选择入住在此,也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从胡金芳饭店前往大林寺、仙人洞都很方便。

据老人们讲,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金芳年纪也大了,将饭店经营交给家人打理。庐山解放后,胡金芳把整个饭店卖掉,全家移居汉口。不久,他的两个儿子都光荣地参加了解放军,而且当上了空军飞行员。



编纂典籍的罗裕樟

罗克岩

民国元年(1912年)元旦这天,中华书局在上海创办,创办人陆费逵为了曾经立下的誓要编撰一部新字典的宏愿,向几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发出了邀请。不久,身在九江的罗裕樟收到一封邀请函,邀请他赴沪参加《中华大字典》编纂。

罗裕樟,字幼芬,号伯诚,讳裕,裕樟为其榜名。清咸丰九年(1859年),出生在九江府白鹤中乡第一保(今九江市柴桑区狮子街道仲山村罗家中门村)。他自小聪明好学,在家乡发蒙读书,稍长辗转于南昌、九江求学,先后就读于经训书院、友教书院、豫章书院、濂溪书院、白鹿书院等地。他勤奋刻苦,曾把《康熙字典》工工整整地抄写过三遍,也因此练就了字词上的“童子功”。可见任何高深的专门学问,都要从看来是最拙笨的基础工作上下工夫。

光绪五年(1879年)县试取秀才,光绪十一年(1885年)考取拔贡,光绪十七年(1891年)中举,次年赴京会试,没想到名落孙山。罗裕樟留京十余年,屡次参加会试,一直无缘进士及第。为了维持在京生计,他在供清朝宗室子弟入学的宗室官学任教,后来又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任教。

晚清时期,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废科举、兴新学、办学堂,向西方进步文明学习,以求国家富强的思潮得到广泛传播。耳濡目染之下,罗裕樟接受了新思想,加上京城从教经历,改变了他前半生一心一意为科举奋斗的人生目标。

在时代的大潮中,九江的新式教育应运而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3月,九江道台瑞澂、九江知府罗纲乾等地方官筹划经费,聘请名师,将九江府属官办的濂溪书院,改为官办“九江中学堂”(今九江一中与九江职大前身)。罗裕樟曾接到聘请,邀他担任教员。

被聘为分科教学,他回到家乡,甘愿做个教书先生。也是这一年,任山西学政的进士刘廷琛告假还乡,回到九江潜心治学,得知罗裕樟已回乡就任教职,立即邀请他到刘家私塾执教,罗裕樟也欣然应邀。

民国元年,罗裕樟接到了中华书局邀请函时,正逢其夫人不幸去世,他撰写了一副挽妻长联寄托哀思:“劳劳三十年,君独贤,百事乖,百事哀,清夜只余呼负负;茫茫九万里,吾安适,一身病,一身老,仰天谁与和乌乌。”沉浸在哀伤、孤独中的罗裕樟接受了中华书局的邀请,再度离乡远行。这次上海之行,也成就了他这一生最辉煌的事业。

加入《中华大字典》编纂团队后,罗裕樟承担编辑工作。四年后,《中华大字典》杀青,罗裕樟又参与《辞海》编纂。陆费逵在《辞海》编印缘起中称:“刘范猷,罗伯诚……诸先生分任其事”,“罗伯诚”就是罗裕樟的号。其间,他还参加了《清史稿》编纂,为协修人员。《清史稿》编纂者大多有功名,博学多闻,国学底蕴深厚。罗裕樟位列其中,说明其学问能为学界信服。

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闸北,发生“一·二八”事变,罗裕樟从上海回到九江。1938年7月,日军进攻九江,79岁的罗裕樟老人孤身一人开始逃难,7月25日不幸病逝于南昌火车站,由在南昌的一位族人及两位门生,将他厝葬于老福山,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迁回九江归葬故里。

笔者搜集的罗裕樟资料中,还有两条存疑的记载,均载于台湾《文讯》杂志(2011年10月)和《罗氏宗谱》。一是,称蔡公时、魏道明等人均为罗裕樟授业门生,查阅相关史料,有诸多不合逻辑的疑点。二是,称罗裕樟还参与了《辞源》的编撰。遗憾的是,第一版《辞源》50位编者名单中没有他,一些相关回忆文章也没有提到他。罗裕樟是否参与了《辞源》的编撰,具体承担了什么工作,暂时没有确切的答案。

《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清史稿》都是中华文化瑰宝,参与其中任何一部的编纂,都足以以家乡增光。九江人罗裕樟至少参与了其中三部编纂,仅凭其一己之力,已让九江文化在中华文化的星空里,闪耀出永远不会消逝的光彩。

文峰几度夕阳红

谢飞鹏

从永武高速武宁县宋溪出口下来,驱车直驰,过一道缓长的坡路,可以看到左边山峰上屹立着一座高高的文峰塔。很多人认为文峰塔是佛塔,其实这是错误的。关于文峰塔的功能性质,还得从它的修建讲起。

嘉庆元年(1796年)六月,武宁迎来了新的县令朱圣哲,举人出身,云南通海人。到武宁后他查阅县志,发现这里虽然偏居一隅,但“户口之殷,土风之美,文章节义之著闻,皆与大都相埒”。让他感到诧异的是,“科目仕宦竟寥寥焉。”清朝百余年来,仅考中两名进士。

朱圣哲立即召集当地人士了解情况。那时人们是比较迷信的,认为要出人才,除了重视文教,也要地脉辅助。武宁老城南傍修江,北岸靠玉枕山,东临狮子岩,西倚四望山。川谷环绕,虽然很美,但修江流经县城,前面空的,藏不起风水。朱圣哲听取众人的意见后,决定修建一座宝塔,以弥补风水不足。因为这座塔是助力文教兴盛的,便命名为文峰塔。

塔址选在东渡对面的凤岗上面,并于当年冬天动工。兴建宝塔得到全县的大力支持,大家踊跃捐资,经过一年多时间终于建成。文峰塔共七层,内可通梯,外可绕槛,八方围圆,广袤合度。朱圣哲为该塔题写了“光腾云汉”四字,并于边上另立一小塔,俗称“风口塔”。嘉庆九年(1804年),因受风雨侵袭,文峰塔受损严重。时任县令刘照黎主持对该塔进行了修缮,并由原七级增为九级,为全县造型最大的古塔。

或许是巧合,嘉庆四年(1799年),也就是文峰塔建好的第二年,武宁考中两位进士,为县城的张富业、张富经。一时间,全县轰动。嘉庆二十一年,言朝樾任武宁县令。他在《重修文峰塔记》中写道:“曲阜言朝樾以嘉庆丙子下县武宁,时武宁人文不振,乡会蝉联。金曰‘非文峰之效不及此’”。文峰塔建成后至1821年,23年间武宁有6人考中进士,19人考中举人。

笔者认为,明清之际,当地之所以很少有人考中进士,主要和当时大环境有关。明末天下大乱,李自成率军转战武宁。康熙年间,武宁又屡遭“白头兵”之乱。社会不太平,生活都困难,科举之路又从何谈起?朱圣哲修建文峰塔,更多的是给当地士子树立了信心。用现在的目光看,依靠风水是不靠谱的。但作为一位封建官吏,能有这种民生情怀,还是令人敬佩的。

可惜的是,文峰塔在“文革”中被损毁。柘林水库(庐山西海)修建后,塔基也沉入水底。2002年武宁县政府拨款于武宁大桥北端狮子岩顶重建了文峰塔。新建的文峰塔高三十三丈,塔面六方,外廓环砌;底宽近三十五尺,层九级,内梯盘旋,并建小塔于近处。如今,文峰塔面临庐山西海,俯瞰整个县城。登临其上,举目千里,一望空阔。特别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文峰塔的长长身影倒映在西海粼粼的波光里,“文峰夕照”被誉为“武宁新十景”之一。



▲ 包泽伟 油画《能仁寺》(1972年)



▼ 邢世平 水彩《能仁寺大雁塔》(2023年)



▲ 陈良孟 国画《能仁寺》(2019年)



▲ 孙慕文 水彩《从双峰小学看能仁寺》(1974年)



▲ 宋跃林 油画《大雁塔》(2022年)

画中的九江能仁寺(中)

孙海帆

能仁寺有着较为复杂的历史沿革,据文史专家张廷考“唐后期对梁武时期的福圣寺和浮图塔有重修,宋元重修,并更名承天禅院、能仁禅寺,明清再重修,又更名能仁寺,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1966年7月,能仁寺遭受到一次毁灭性破坏,当时冲进寺内的是一批“小将”。此后一直到1983年的17年间,能仁寺没有僧人,大雁塔长了许多野草。1972年的一天下午,两位15岁的少年包泽伟和胡有源从对面的同文中学悄悄潜进能仁古刹院内,支起简易的写生画架,在蚊虫叮咬中匆匆开始了对大雁塔的写生。

如今,胡有源当时的习作已难以寻觅,而包泽伟的这张在硬纸板上的写生却被他的邻居兼小画友蔡志平保留了下来,这是大雁塔在“探索年代”珍贵的绘画记录,也是大雁塔“灰头土脸”时期的彩色影像。虽然光华不再,但能仁寺还总是被人惦记,1974年,刚刚高中毕业17岁的孙慕文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来到寺院隔壁的九江双峰小学操场,在那里气定神闲地画了一幅水彩写生《从双峰小学

看能仁寺》,在画中大雁塔和大雄宝殿清晰可见,明媚的秋日阳光将梧桐树染得更加金黄,院内玩耍的孩子传达出一种快乐的气氛,这一切似乎在预示着能仁寺的新生。

“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1983年,在孙慕文此画之后的第九个年头,能仁寺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开放寺庙,1986被认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寺内的大雁塔被认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此,画家们也可以光明正大地对它尽情描绘了。

如今大雁塔的光彩形象是和孙慕文同年的邢世平所绘,仍然是金色的秋天和蓝天红叶,和半个世纪前相比,大雁塔显然“精神”了很多,时代的变迁竟然被这两张画所概括。

2022年经国务院批准,九江市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此,九江美术馆向全市广大书画家们征集一批反映九江城市风貌的作品。在众多作品中有一幅油画《大雁塔》,它的作者是现任九江美术家协会主席宋跃林。

和众多土生土长的九江籍画家不一样,宋跃林是在少年时唱着“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有我的家”,跟着搞石油事业的父母来到九江的。青年时期,他从位于市东郊的九江炼油厂来到市内的文化宫学素描和书法,其用功和努力颇有石油工人的干劲。此后,他在文学、美术、书法的“三维空间”苦心修炼二十年,终于在1998年凭借《老井·女人》获得第四届全国水彩粉画展银奖,这年他39岁。

宋跃林的这幅《大雁塔》中高塔没有雄伟的感觉,院内的树木竟然与其比肩,画面采取传统绘画中较为忌讳的左右一分为二式构图,但右侧塔下的树木又将这种忌讳消解。“客体在宋跃林的写生作品中已隐退其后,观念的介入并贯穿始终,自主性不断得到强化,个体语言亦逐渐清晰。”徐东林对宋跃林作品的评说在《大雁塔》中得到印证。中国艺术评论家尚辉说“宋跃林笔下的灰蓝色特别漂亮,用这种颜色表现城市也恰如其分”,也在这幅画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未完待续)

